

中国抗战秘闻

白修德回忆录



[美]白修德 著 崔陈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06

K265.06

12

中国抗战秘闻

白修德回忆录

河南人民出版社



2268

中国抗战秘闻
——白修德回忆录

〔美〕白修德著 崔阵译

责任编辑 夏晓远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修武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180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215-00153-9/K·43

统一书号11105·218 定价2.00元

译者序

作者西奥多·怀特，中文名字白修德，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记者兼政治评论家，祖籍俄国，1915年出生在波士顿的一个犹太家庭。因为家境贫寒，孩提时的怀特被送进免费的波士顿公立拉丁学校读书，幼年丧父，十六岁的怀特不得不中断学业，到街头卖报维持家计，饱尝了30年代的那场经济大衰退给穷人带来的痛苦和辛酸。

1934年，怀特获得了220美元的奖学金和180美元的报童基金，合在一起恰好是一个学期的学费，因此，他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读书，以后转入该校的东方研究所学习中国历史。五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怀特来到了中国，乘飞机从香港飞到国民党的战时首都重庆。他先是受聘于中国新闻部任顾问，不久辞职，当上了美国《时代》杂志驻亚洲记者兼远东编辑。他在中国一住就是六年，和中国及中国人民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

怀特于1945年应召回国后定居在纽约，同雅各比夫人合著了以中国为题材的文学回忆录《中国之怒吼》；又于1948年编辑出版了《史迪威文件》一书。他于1946年结婚，夫人是比特丽斯·霍夫斯达特。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儿海登是英文教员，儿子戴维是新闻记者兼小说家。

1948年，怀特作为美国“海外通讯社”的驻欧洲记者，举家迁居巴黎，报导马歇尔计划的执行情况。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有《灰烬中的火焰》。

1953年，一个在海外漂泊了十多年的游子回到了美国，但回国后的生活却不如人意：他先是同替中国共产党说过公道话的许多美国进步人士一样，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吊销了护照，继而是雇用他的一家杂志破产倒闭，他成为一名无办公室可去的失业者。这时候，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撰写了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优秀小说《山路》，受到好评，并拍成了电影，稿费足够全家两年的开支。因此，怀特决定实行一生职业的重大转变，首开美国新闻史上的先河，单枪匹马地投入美国总统选举的专业报导。美国每四年举行一次大选，产生出一位总统，他就写一本《总统的诞生》的专著。

这个具有冒险性质的写作计划，经过怀特锲而不舍的奋斗，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系列丛书《总统的诞生》首卷在1961年问世后，立刻受到国内外读者的称赞，荣获1962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它的最后一卷《美国的自我探索——总统的诞生，1956年——1980年》是怀特的封刀之作，也是顶峰

之作，现已被美国驻华大使馆、领事馆作为了解、介绍美国当代政治的参考书在中国散发。

怀特先生对新中国态度友好，对已故周恩来总理推崇备至。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曾多次来中国旧地重游，返美后在《时代》杂志发表文章，对我国的现行政策，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怀特因患癌症于1986年在纽约逝世。

本书原名：《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是怀特先生晚年的回忆录。通过这部书，他回顾了自己那波澜起伏、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他一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他所结识的著名人物都在这本书中有栩栩如生的回忆和描绘，并根据他自己的认识水平，给予中肯、公正的评价。1980年，这本书成为美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原书共有四部分、十一章组成。我所翻译的是其中原名为“亚洲”的第二部分。

这一部分由一个引子和五章组成，占据了原著的近一半篇幅，是怀特着力刻划的重点，也是原著中最精彩、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在本书里，怀特以他亲身的经历和见闻为主线，对中国抗日战争中，中美两国的交往中以及中国新闻史上一些重大的事件和众多的历史人物进行了回顾，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并据此提出了他自己的新颖独到的见解。译者相信，本书对于从事研究抗日战争史、中美关系史的史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以及对这“两史”有兴趣的朋友们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本书中，怀特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日本侵略军的战争暴行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揭露。同时，通过对山西的晋东南地区(中条山)的实地采访，对中国共产党崭新的政治理想和策略表示由衷的钦佩，并勇敢地断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终将在中国取得胜利，一种崭新的政治和文明将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相反，作为美国人的怀特，对那个由亲美分子垄断着内政外交，“连做梦都在英语中进行”的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表示盲目的肯定态度。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特别是亲眼目睹了1943年震惊中外的河南大灾荒，他发现这个政府里的官员对自己国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对自己的人民一无所知，在他的面前“都成了一堆废物”。怀特在本书中反复强调一个基本观点：政府只有履行保护人民的职责，人民才有理由接受它，否则，就应该拒绝它。因此，他得出结论：象国民党这样的不能为人民建立有效秩序的政府，应该让它垮台得愈早、愈彻底愈好。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怀特是一个美国决定论或者说是美国至上主义者。他把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完全归功于美国的参战；对于中国政治的观点，也完全是建立在怎样对美国更有利的基础上的。这是怀特先生心灵上的毒瘤，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予以充分注意。

应该说，怀特在本书中所提供的主要史料是翔实的，准确的，可信的，但也不能不看到，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存在着某种偏见，对中国抗日战争中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也不可能了解得尽善尽美。凡是发现明显与事实

有出入的地方，译者都尽量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对于他含有偏颇的观点，以及未发现的错漏之处，只好请读者自己留心了。

译者翻译这样大部头的英文原著还是首次，对我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也研究甚少，因而本书的翻译无论在技术上或是内容方面一定存在为数不少的错误和缺陷，诚恳希望翻译界和史学界的朋友们批评指正。

本书的英文原著是著名的旅美作家江南先生（刘宜良）生前赠送给我的，并多次鼓励我克服困难，早日将此书译出奉献给中国的读者。值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向江南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先生的遗孀崔蓉芝女士致以深切慰问，并向为此书的出版倾注了极大热情的我家乡的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致以衷心的感谢。

崔 阵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日

於沈阳

目 录

译者序	1
开场白 一个观光者	1
第一章 中国：战争与抵抗	11
第二章 亚洲采访：名人轶事	65
第三章 史迪威：跨上死马的骑师	110
第四章 延安：革命探密	183
第五章 胜利的政治：亚洲	235

开 场 白

一个观光者^①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正离开波士顿的羽毛未丰的大学毕业生，好象是从望远镜的反端去凝视某些不认识的事物一样，我所能看见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匆匆过客，挟带一只箱子和一台旧打字机，准备周游世界，在回国之前成为一名历史学教授——一个典型的青年观光者的形象。

作为一个年轻的观光者，我进行了多年的准备，出于保存资料的考虑，强使自己养成了作笔录和记日记的习惯。就是这些从哈佛到中国的匆忙的旅途日记为我构筑了一条唯一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才得以从一个世界跳出来，进入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① 本节原为第三人称，为便于读者阅读，现改为第一人称。

当时的我一身具备两个完全不同的传统，一个是犹太人的精神，另一个是新英格兰人的习俗。它们伴随我登上路程。

当我在1938年从波士顿出发时，还在进行着犹太式的内省。直到那时，对于龙虾、蛤肉、猪肉、火腿和其它显而易见的非犹太教食品从来未敢问津。同我的导师共进早餐时，我总是把咸猪肉推到鸡蛋一侧，再藏到烤面包片底下。我那时是个恪守古老社会传统的纯正的犹太教徒。不论是我，还是我在哈佛的任何一个朋友——不是一个人——都没有在毕业之前同任何一个性感的女人有过交往。在古老的犹太传统里，性生活只能在婚后进行，在结婚之前连接吻也是不允许的；那时被视为越轨行为。

但我仍然是波士顿人。波士顿的贾奇·贝克基金会是一个度假指导中心，当时就有人对我母亲说，你的儿子聪敏过人，智能超群，会成为一个电气工程师的。但是，波士顿的善举把我从祖传的基础里拖了出来。波士顿的善举给我带来了巴勒斯报童奖学金^①，给我带来哈佛的另外几笔奖学金；并最终又使我荣获谢尔登旅行奖金^②。这些钱使我离开了我的出生地，踏上了经风沐雨的旅程。

关于这次短促旅行的日记开始时几乎全是个人方面的私事，但时间仅仅几周，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日记一开始几乎是围绕三件事。第一件是钱——汽车票价，的士小费，侍者小费，还有关于旅馆价格的争论。第二是性——我对异性产

① 巴勒斯（1837—1921），美国作家、自然主义者。

② 谢尔登（1833—1897），美国教育家。

生了强烈难禁的憧憬幻想。在旅途中，一遇上妓女，就使得我陷入对性的想入非非。最后一件是政治——在业余时间我试图用在哈佛学到的历史教程去解释旅途中所见到的一切，这些记满了一页又一页。但是，这些在1938年的秋天和1939年冬天里的见闻，我只有以后才能真正理解。

穿越欧洲的旅行是短暂的，没有做什么深化理解力的事情。欧洲同报纸上和教科书里描绘的一模一样，慕尼黑危机刚刚过去，但在1938年10月，防毒面具正在伦敦分发，海德公园新挖的防空堑壕清晰可见。巴黎还是象布林顿教授描绘的那样妩媚。离开巴黎，我去访问了我的祖先发祥地——巴勒斯坦。

那时，约有45万犹太人居住在后来成为以色列国的地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已经相互难以忍受。阿美卡协会的伊曼纽尔·拉比斯，是我哈佛的同窗好友，也是哈佛乐团的一名有才华的小提琴家。他是在一年前到巴勒斯坦的。时过一年后再见到拉比斯，不禁令人大吃一惊。拉比斯选择了一条献身于一种事业的道路。拉比斯已经在此安家立业了。他在一个移民的柑桔种植园里，工作是骑马搜集处在收获季节的柳条，拉小提琴的手满是干活农民的那种老茧，额外工作使他精疲力尽，瘦骨嶙峋。拉比斯想要建立一个以色列国，正在学习用枪。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是可以撰写一篇故事的。在我看来，这场冲突恐怕还要再持续几个星期——最短也足够给温斯普先生发这个故事的稿件，也许他正在付印《波士顿环

球报》呢。温斯普买下了这个故事，但我当时并不晓得他已经使我的名字第一次见了报。还是几个月后到达香港时，我才发现在快邮的《波士顿环球报》上刊登了这则故事并收到一张8美元的支票。8块钱不可少，快邮的报纸尤为重要。有了这份报纸，我就能在上海宣布，我是《波士顿环球报》在远东的记者，晃动这份报纸，不啻是一份工作委任书，它的作用是温斯普先生未曾想到过的。

离开巴勒斯坦到亚洲，乘坐的是艘挪威货船M.V冰湖号。这个运载工具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我所学过的关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概念。这艘货船在经过大英帝国的地图上所标明的每个点时都要停泊，当时，这个帝国正在从其旅程的顶点开始走下坡路。苏丹、亚丁、科伦坡、新加坡，也许在某个殖民者的办公室里，存放有殖民地码头的标准设计图纸；每个码头都有整洁的混凝土防波堤，都有直通停泊处的单轨铁路，起重机卧在铁轨上，它的长臂在把货物吊上卸下。当地土著的情况却是因地而异的。苏丹港用非洲人卸货，亚丁港用的是阿拉伯人，锡兰港用的是泰米尔人。泰米尔人那一绺一绺的黑色长发在背后扬拂。锡兰盛产茶叶。一个蓝色的霓虹灯在客运码头闪烁，上写“锡兰名茶”。新加坡港则使用中国人干活。这艘船所到之处，都是英国人的天下。我去新加坡的邮局时，注意到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都在站着排队，我也站在行列里准备寄封信。后来有一位白人妇女把我拉出了队列，她严肃对我说：“白人是站在队列前头的。”我当时真象在旧时南方的客车后面被人家捉住一样。每个停泊

的港口，以及整个亚洲的边缘地带，白人都是在队列前头昂首阔步，“土著”在后头俯首听命。

上海是难以同帝国主义的巴黎相匹敌的，但在教科书上倒是预见它们将会是一样的。几个月来，我一直把上海作为活动基地，不时宣称我是哈佛大学谢尔登旅行基金会的成员和《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从上海又到了天津和北京，并闯进了日本皇军的新闻发布会，每天下午去听军事发言人发布关于中国战事的报告，什么中国的战争已经结束，皇军正在肃清残敌。我曾不顾羞耻地讨那个日本皇军发言人的欢心，劝说他发给我这个《波士顿环球报》特派记者一张去满洲的通行证。但在这头几个月里，事事都不顺心，我只好又回到了上海。

上海是就业的集中地。在30年代，为数不少的美国记者，厌恶家庭琐事，便到上海或巴黎搞口头报导。在这两个城市里，英文报纸雇用了一些不太著名的记者。如埃里克·西瓦里德和埃德加·斯诺就在充任临时编辑。所以，在上海的三大英文报纸中，经验丰富，靠卖苦力挣钱的美国记者真是为数不少。

我有时四处闲逛几天；有时，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租的房子里敲打打字机；还经常去推开没有笑脸相迎的办公室去寻找工作，记者、作家、店员、办公室杂役都可以干。两个月后，快到旅行期限时，我竟想留在中国，不想再回波士顿当历史教授了。当我散步时或四处游逛时，当我坐在汽车里或坐在黄包车上洋洋得意时，看到这个城市充斥着光怪陆

离的现象，神甫牧师，灯光欢笑，花园流氓，上海确有其独特之处。在这个中国人居住的城市里，统治者是白人，对于它的最底层，我这个波士顿来的穷孩子感到难以置信地绝望，就象上层人物对堕落的喜悦让波士顿的文人们感到不可思议一样。

早在1843年英国人就在上海建立了他们的商业邮政。到1939年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然而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城市。300万中国人生活在上海市政会的司法管辖下。这个市政会是由英国人、美国人和日本领事官员联合组成的。毗邻的法租界由法国人统治，仍保持傲慢的独立性。上海的中国人是没有权力的人民，他们的法律、法庭、警察都是远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外国人所强加的。上海是个开放的城市，在外滩，酒吧、鸦片馆、妓院、黑社会、流氓团伙应有尽有。我逛过妓院，却并未染指过女人；在夜里我和其他失业的新闻人员一块喝酒。这个城市在痛苦，我也跟着痛苦。上海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这个记忆一直延续到1972年。那时，我随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重访旧地，一眼就看出，著名的上海滩一改过去那肮脏、灰暗、残骸遍地的旧貌，注入了迷人的魅力，但与久已消逝了的奢侈享乐对比，又给人一种难言的悲哀。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上海变成了一座居住型的城市，既无欢乐也无恐慌。

我第一次被吸引停下来观光时，我曾在日记中记下了上海的一天。那天是参观上海的工厂。那时，无人对中国工人看上一眼，尤其是中国的富人更对中国工人不屑一顾。当英

美在良心上感到有点阵疼时，这些城市的主人们让市政厅建立了一个挂名的工厂督察系统。其中有个警官，是个年轻的丹麦人，名叫克里斯·博杰森，他厌恶这个工作，因为他的感情对这一工作难以承受。有一天，他想开开心，便拉着我和他一齐值勤，希望我能写出一篇故事来。

我们一齐游览了工厂。有个玻璃瓶厂——在那里工作的小男孩也就是十岁或十一岁。他们拖着木履，抱着破碎的玻璃瓶子，步子沉重地来到一只大桶前，把旧瓶子投放进去进行溶化。我们接着参观了一个纺织厂——博杰森一脚踹开了一筒竹席，那是堆在靠近排水道的工厂垃圾里的，走近一看里边竟裹着一个小女孩的尸体，曾是工厂里的小女工。每天夜里总有二至三领这样的席子扔出来供垃圾站收殓。再下一个是缫丝厂，蒸汽棚里滚热烤人——在这里工作的女孩子只有六、七岁，她们的工作就是一天到晚站立在蒸汽缸旁。丝茧在缸里的开水中溶解，她们再从里面捞出丝线，解开挂在细钩子上。博杰森领着我到作业线上，他轻轻地拉过来一个小女孩，我发现她每只手的关节，手指连同手掌都在腐烂。皮肤上起了水泡，肉和脓血都裸露在外。就这个样子了，她们的双手每天还都泡在茧缸里。博杰森说，这样的孩子都是从农村她们的农民父母手中买来的。如果她们死了，也象那家纺织厂的女孩子一样，用竹席一卷，运走拉倒。我想把它写成小说，可真写出来后，却没人买，就连《波士顿环球报》也不理睬。

我为所看到这一景象感到震惊。以云游四方的观光者的

心态，我在日记中记载了我决定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或是做一个革命者，或是党人或是一个鼓动家，都可以。但在上海的那几个月里，我遇到的最激进的团体竟是一帮托洛茨基分子，全是清一色的白人和漂泊者。他们几乎是立刻把我摒弃在这个组织以外。一个我最为佩服的人对我说：“怀特，你只是一个社会党人，你要放明白点。”

所以，我又通过别的途径去采取行动——当时在亚洲进行的最大行动，没有疑问，就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建立联系，就要往西行，那是一片被群山和峡谷所隔离的地方。这场战争也是反法西斯阵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就象西班牙那场忠于共和政府的战争一样。我同蒋介石的人取得了联系，吁请他们为我提供帮助。我不能再在上海滞留了，钱快用完了。我计划在赶回波士顿之前，一定要先看看中国内部的情形。

我买了一张船票，乘英国的蒸汽客轮从上海到河内，计划从河内沿法国的铁路到昆明。也许能在昆明，找到通向蒋介石穴居的山城——重庆的道路。那时再返波士顿，但行动一定要快，赶在谢尔登旅行奖金告罄之前。

一艘巴特菲尔德·史威里公司的客轮载我驶离了上海。我坐在二等舱里，附近还有一群妇女，是一帮正在待命的英国军官的夫人，她们是被运到帝国环形防线上的另一块前进殖民地去。船上没有三等舱，其余是苦力和甲板阶级的栖身之处。我和这些大腹便便、没有韵味、平平淡淡的英国女人一块坐二等舱就算不错了。我有点喜欢她们了，因为她们也